

# 对传统目录学的反思与建构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读后

王少帅

**摘要** 从“宏观建构,理论言说”的著述理念、“结构谨严,定位准确”的学术理性、“史论结合,真知灼见”的论证方式等三个方面分析评述傅荣贤教授《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一书的突出优点。该书在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基础上,审察中西目录学之异同,继而揭示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核心价值,建构起较为完善的古代目录学理论,并指明了中西目录学有机结合的发展方向。但该书对中西目录学有机结合的具体操作论述稍显不足。参考文献 7。

**关键词** 傅荣贤 古代目录学 书评

---

##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After Reading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Wang Shaoshuai

**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merits of the Professor Fu Rongxian's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writing idea of macro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discourse, the academic rationality of tight framework and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the argumentation way of combining history with theory. The book gets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judg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bibliography, and then reveals the core value of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constructs the ancient bibliography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bibliography. But the discussion of how to operat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bibliography is insufficient. 7 refs.

**Keywords:** Fu Rongxian;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Book Review

---

2017年5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下文简称《研究》)一书。拜读过后,诸多不得其解、探索无果的疑难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研究》一书,基于文献史料,绵密编织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还原古代目录的本来面貌。作者不囿于史学叙述,亦不附和学科规范,站在学科建设和中国话语权的高度,以清晰的理论逻辑言说中国古代目录的非逻辑事实。笔者就读后所得,向读者介绍、推荐傅教授这部在反思中建构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的开拓之作。

### 1 宏观建构,理论言说

中国古代目录源远流长,余嘉锡认为:“《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sup>[1]</sup>班固《汉书·艺文志》删减《七略》,遂成十志之一,之后各代史志相沿不改,《艺文志》之目录定为史学支脉。官修目录中,尤以《四库全书总目》为最,集中国古代目录之大成。此外,宋元之后涌现出一大批民间私人藏书目录,与史志、官修目录等并行发展,交织相映。所以,中国古代目录成就蔚为大观,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往关于古代目录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史学范式的事实叙述,重点是对“目录学史”的研究。

这是由古代目录学归属于史部决定的,是先天因素。第二,学科范式的逻辑规范,重点是客观化、逻辑化地利用文献。这受到近代西方科学主义目录学的影响,是后天因素。这两种研究方法都不能落实到“目录学”本体的研究,也缺乏对古代目录学发展至今的学科关照,因而具有片面性。傅教授基于对古代目录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深感这两种研究揭示出来的目录学理念均非古代目录学的本来面貌。有鉴于此,作者“既努力突破重视史料挖掘与史实剪裁的史学范式,也拟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从古代目录学事实中抽象、概括其普遍规律,从而最终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特点的、因而也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学理体系”<sup>[2](2)</sup>。由此可见,作者并不以固有的史学为限,也不附和西方目录学规范,而是合情合理地评估中国目录学厚重的历史传统,审察现代目录学移植古代目录学的合理性和适应度,进行批判继承与吸收<sup>[3](19)</sup>。在此认识之下,古代目录学理论建构由此展开。

首先,古代目录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建构以古典文献与现代文献的差异性为逻辑起点。无论是古代文献还是现代文献,如果我们进行“文献是什么”的本体追问,因其答案的差异,也就构成了中西目录学不同的逻辑起点。现代文献被置于一个泾渭分明的学科规范之中,严格遵循逻辑引导的主客二分的思维,追求的是真实性、标准性、科学性。而这也是直接导致现代目录学以高效率的文献检索为目的的根本原因。古代文献则是在整体性、辩证性的思维指导下,由追求“道器合一”“修己经世”等兼具知识事实和价值判断双重品格的文献形态组成,文献的价值内涵是其本质之所在,这是古代目录学具有“申明大道”理想诉求的根本原因。姚名达认为,“严格论之,现代目录之稍进于古录者,惟在索书号码之便利与专科目录之分途发展耳。目录之内容,分类之纲领,究未适合书籍之需要也”<sup>[3](308)</sup>。姚氏此言甚确,中国古代目录较之现代目录的最大不同在于蕴含有文化秩序。傅教授指出:“类名、古代文献、古代书目、传统文化,这四者之间是

相互通约的”<sup>[2](264)</sup>,即他们具有统一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内核饱含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与人伦内涵,对这一精神内核的揭示与阐发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西目录学的本质差异,又是整个理论阐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理论言说中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作者在对古代目录学理论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仅有对宏观文化背景差异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落实到对目录学内容和形式的微观考察上,这样建构起来的理论才能丰满,显得“骨肉”匀称。傅教授以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为背景,从古代目录的内容旨趣和形式结构出发,围绕着古代目录之价值内涵这一核心因素,揭示出“古代书目中的著录、分类、序言、提要、乃至小注、案语等技巧性软件,无不致力于对文献价值内涵醇驳得失的评鹭,从而规范读者对文献的接受和认识……”<sup>[2](319)</sup>,即从文献单元的标引和文献单元之间的关系两个大的方面逐一进行研究。例如,对序言的研究,作者专有一节论述,从书目总序、大小序逐一分析直到具体文献本身,揭示序言在起到辨明学术源流的同时,也含有教化的意味,“即在于惩恶扬善,达到衮钺斯昭的政教人伦目的”<sup>[2](304)</sup>。所以,作者在整体理论框架的把控和具体文献书写的分析上都达到了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容的辩证统一,使论证言之有据,理论建构更加丰满。

## 2 结构谨严,定位准确

《研究》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五章是总结,其余三章各就一个专题进行论述。具体来讲,第二章具有总论的性质,作者将中国古代目录的“内容旨趣”与“形式结构”两块核心内容提炼出来,尤其是对“内容旨趣”关涉的精神指向和道德关怀的论述,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作者总结清儒章学诚之见,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内容集中于“部次条别”的技术内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内涵、“申明大道”的理想诉求等三个方面,三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sup>[2](32)</sup>。其中前两个方面多为研究者所重,而“申明大道”的理想则是

对技术与知识的超越,鲜有人提。所以作者在揭示“申明大道”的同时,又对其隐而不彰的境遇进行了反思。至于目录“形式结构”的设置也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包括“文献单元的描述和标引(著录和提要)”“文献单元关系的组成和揭示(分类和序言)”两部分。之后的第三章“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标引”与第四章“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则是更加具体的分析。第三章从“现代文献”的本质、文献标引、文献组织等入手,紧接着引出“古代文献”的本质、文献标引、文献组织,在这种对比中更加凸显出中国古代目录的特色与价值。作者认为古代文献都是“字面意义上的知识论内容(文)和文本后的价值论内容(献)的双重存在”<sup>[2](98)</sup>。这就是中国传统语境中“文以载道”或者“道器合一”的体现,亦即传统观念中“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sup>[4]</sup>的诠释。即使如文献标引的书名、作者等,也都在人们的教化观念与道德接受范围之内,不存在脱离当时文化认可的文献。而这种貌似仅起到检索功能的著录,也在整个目录编排中负载着人文精神的期待与传达,更别说充斥着主观评价的目录提要了。所以,作者对目录中所包含的每一种著录信息都加以研读,以期超越知识层面而达到对目录的理论言说,进而发现其价值内涵。第四章主要是以“分类”为核心,展开论述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问题。因为古代文献的价值论内涵才是其本质之所在,那么这种价值所追求“大道”指导下的组织关系自然也很复杂,而组织关系的复杂就意味着目录学编排所蕴含的认知维度的多样化。所以,古代目录的组织形式就表现在“追求个别化的差异性文献在自体之‘道’上的统一”“疏淡于语法”“重视历时性的次序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等三个方面。

此外,古典文献的核心特征,一是重视价值而疏于事实;二是重视主体介入而置“客观性”于不顾。该书认为,这也是古代目录学的核心特征。事实上,古典目录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彼此形塑、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论语·卫灵公》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认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sup>[5]</sup>正是这种

人道相合、彼此形塑的传统,所以必须双向来看,诚如西人卡西尔所论“但只是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而不是从它们的彼此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来把握它们,它们作为文化客体的特定含义便不可能被我们全面理解”<sup>[6]</sup>。这就是作者所定位的文献与人的关系,即“一是在源头层面上强调文献与作者的合一;二是在传递层面上强调目录学家或书目编制者对现实文献的主体干预从而充分突显文献的价值内涵;三是在读者层面上强调‘以意逆志’从而捕获文献的价值内涵并与作者完成交际”<sup>[2](314)</sup>。所以,从对文献的认识到形成文献的编排,他们都是经过编目主体的处理而成,充斥着价值论断而非原汁原味,即“文献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只有为人所接受的文献,而不存在人的主观认识之外的文献”<sup>[2](111)</sup>。这正是作者将古代目录学研究定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所得出的认识,即“目录学研究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必须从表层的文献结构深入到书目所蕴含的心理、文化、认知等层面。……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理解目录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努力在‘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本位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sup>[2](24)</sup>。作者能够深入探明目录学的原貌,即源于其准确的定位。

### 3 史论结合,真知灼见

《研究》一书在目录学学术价值和目录学之分类符号、类名等问题上的论述新颖,多属创见。

首先,关于目录学的学术价值。作者将目录学的学术价值概括为三个方面:揭示以“三代”为节点的学术“源”与“流”;考辨具体学术问题;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长程历史<sup>[2](41)</sup>。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念进行了正本清源。章氏之学术“源流”并非是与学术史相等同的概念,而是“‘三代盛时’之‘源’的理想境界和‘三代而后’之‘流’不复三代法度的现实两个层次,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即在于通过‘源’‘流’的疏浚,返本三代之‘道’”<sup>[2](44)</sup>。这种历史性的正诂确论,辨明了此目录学理念以道为

归的旨趣,纠正了学术界的误读。但章氏的这个理念并不妨碍目录学本身对学术发生、发展的长程历史的揭示。另外,虽然目录学和学术史具有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有天然的契合。作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反思:目录学对学术史的呈现显得鞭长莫及,两者并非同步;同时,目录学的编排左右着学术史的彰明与否,即“左右着人们对学术文化的接受和理解”<sup>[2](58)</sup>。而这种目录学学术史价值的分析又贯穿到文献标引、文献组织的论述中,在相对分散但又集中的论述主题下,一以贯之,全面深入。

其次,目录分类及其类名设置。作者从文献之间的关系入手,由文献之间的关系引出目录组织,而目录组织莫过于分类和类名等内容。中国自古就有“立象以尽意”和“以类万物之情”的传统,所立之象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标识,并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但这一符号“存在于—结构化的文本中,且此结构化文本有其对应的结构化情景”<sup>[7]</sup>。这种结构情景以伦理教化为旨归,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体现在目录类名的设置上。单就类名这一种目录学意象来看,作者仍是系统地依次论述“古代目录分类标识”“目录类名”“古代目录中类名的来源”“类名的知识论内涵和价值论内涵”等问题。我们所接触的四部类名中,以经部为例,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明什么不是经,但却不能定义经是什么,即作者所讲“类名作为一个非逻辑化因而不清晰的概念,拥有一张诗意的面孔,这是与古人的思维相统一的,从而保证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同构关系”<sup>[2](253)</sup>。所以,类名含有传统认知当中的情感、道德、审美等综合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同异是非问题。但它的模糊性并不代表它会产生歧义,目录组织的类序对类名外延的界定会避免歧义的产生,同时类名“能指”和文献“所指”之间也在主体调整中不断适应因袭。这样,“类名”能指的包容性特征便会确立,而其符号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 4 不足之处

在作者看来,古代目录学同样存在不足,一方

面是重视文献的价值内涵,导致文献知识内涵的幽隐不彰;另一方面是目录学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目录学技术的发展也不充分<sup>[2](330)</sup>。因此,作者提出中西目录学的有机结合、文史考辨与现代目录学理念的有机融合等是未来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当然,全书的最大不足亦在于此,即确认中西融合是目录学发展的必由进路,但对如何具体操作,未能做进一步的探究。

#### 5 结语

在关注交叉学科互动、提倡学科视域融合以及建构我国自己的话语权的学术趋势下,作者所建构的古代目录学理论框架并非仅局限于目录学一科,而是可以为文史其它学科提供借鉴。又因目录学是文史学科研究之津梁,所以对目录学理论的揭示显得至关重要。综上所述,该书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固有的特点出发,突破陈规偏见,直指文化根源,是透彻解析我国古代目录学并建构起颇具解释力框架的理论力作。同时,该书传达出作者关于学科建设的承担意识和拓展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 参考文献

- 1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9:7.
- 2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 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4 方以智.东西均注释[M].鹿朴,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471.
-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7.
- 6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沈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8.
- 7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89.

(王少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10-09